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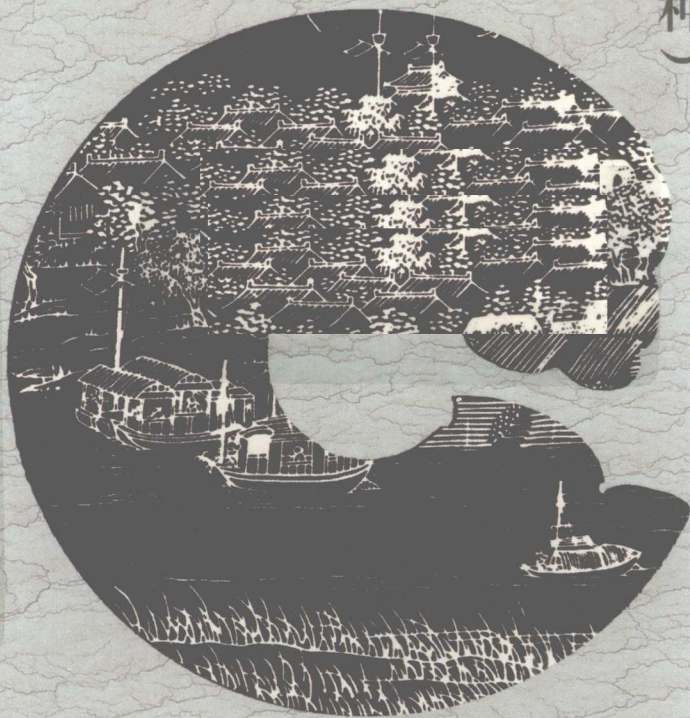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南唐书

(两种)

(宋)马令撰
(宋)陆游撰

南京出版社

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南唐书二种

宋马令撰

宋陆游撰

南京出版社

总 序

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，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有将近 2500 年的建城史，1700 年的建都史，号称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故都”。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研究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。按照南京市委、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，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，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，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，不仅有利于传承、弘扬南京历史文化，提升南京品位，扩大南京知名度，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。

长期以来，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，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。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，无人问津，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。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，费时费力，十分不便。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，充分发挥其资治、存史、教化、育人功能，南京出版社与江宁区文化局在筹备举办南唐二陵发掘 6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，组织了一批相关专家和人员，致力于搜集整理

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、珍贵的经典文献，并把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。为此，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、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；在价值定位上，丛书兼顾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。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，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。

总之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；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，保存稀见文献；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，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。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—

“五代十国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。从唐天祐四年(907)朱温称帝,到宋建隆元年(960)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近六十年间,中原地区先后有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王朝相继更替;中原以外有杨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南平、北汉十个独立王国各据一方。这个时期,全国各地分裂割据政权之间,充满了激烈的军阀混战,造成了频繁的王朝更迭,南唐就是接替杨吴建立的割据王朝。

后晋天福二年(937),时任吴国参知政事的徐知诰,废吴帝杨溥自立,国号大齐,年号昇元。三年(939),因其远祖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,故改国号为唐,恢复了原姓名李昇,定都金陵(今南京),史称南唐。纵观南唐三十八年历史(937—975),先后三帝(烈主李昇、中主李璟、后主李煜),虽为历史一瞬,但其在五代十国中的地位,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忽略的,故两宋一朝,多有记南唐故事的笔记札著,其中,著《南唐书》者有三:一为北宋仁宗时金陵人胡恢,其所著《南唐书》只闻其名,久佚不传;一为北宋徽宗时阳羨人马令,撰《南唐书》

30 卷；一为南宋孝宗时山阴人陆游，著《南唐书》18 卷。现存马、陆二书，互有详略，各有千秋，后世咸谓：“马之纪事也详，陆之为文也洁。”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。

二

北宋马令撰《南唐书》，30 卷。

马令，阳羨（今江苏宜兴）人，生卒年及经历不详，《宋史》等无传。其《自序》称：“崇宁乙酉春正月，阳羨马令。”崇宁为宋徽宗赵佶即位的第二个年号，自 1102 年至 1106 年，共五年，分别为壬午、癸未、甲申、乙酉、丙戌，乙酉应为崇宁四年（1105）。阳羨为今江苏宜兴的古称。由此知马令当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宜兴人。其《自序》云：“先祖太博元康，世家金陵，多知南唐故事，旁搜旧史遗文，并集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，未及撰次，遽捐馆舍。今辄不自料，纂先志而成之，列为三十卷。”则马令《南唐书》乃承袭其祖父马元康未竟之志而作，史料丰富，叙述详备，中多“旧史遗文”均为正史所无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全书 30 卷，采用《三国志·蜀书》之例，名其君为国主。卷内第进次序，有条不紊。卷一为《先主书》第一，记烈主李昇事；卷二、卷三、卷四为《嗣主书》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记中主李璟事；卷五《后主书》第五，记后主李煜事；卷六《女宪传》第一，共计后、妃、公主、义女等 10 人；卷七《宗室传》第二，记楚王景迁等 12 人，其中从庆、从信二人有录无书；卷八《义养传》第三，记徐温及其子孙共 9 人；卷九、卷十、卷十一、卷十

二为《列传》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共记周本、李建勋等 29 人；卷十三《儒者传上》第八，记韩熙载等 4 人；卷十四《儒者传下》第九，记刘洞等 10 人；卷十五《隐者传》第十，记江梦孙等 8 人；卷十六《义死传上》第十一，记刘仁贍等 4 人；卷十七《义死传下》第十二，记皇甫晖等 6 人；卷十八含《廉隅传》第十三记姚景等 4 人，《苛政传》第十四记张宣等 2 人；卷十九《诛死传》第十五，记褚仁规等 9 人；卷二十《党与传上》第十六，记宋齐丘；卷二十一《党与传下》第十七，记陈觉等 6 人；卷二十二《归明传上》第十八，记萧俨等 8 人；卷二十三《归明传下》第十九，记朱弼等 12 人；卷二十四《方术传》第二十，记吴廷绍等 6 人；卷二十五《谈谐传》第二十一，记申渐高等 5 人；卷二十六含《浮屠传》第二十二记小长老等 4 人，《妖贼传》第二十三记张遇贤等 2 人；卷二十七《叛臣传》第二十四，记刘澄等 3 人；卷二十八《灭国传上》第二十五，记闽国及殷政权王氏；卷二十九《灭国传下》第二十六，记楚国马氏；卷三十含《建国谱》第二十七、《世系谱》第二十八，前者记南唐地理，后者述李氏沿革。全书共记人物 160 余，时间跨度上接杨吴，下至北宋，此三十卷之大略也。

马令《南唐书》仿效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笔法，卷首文末多有序、论，以“呜呼”发端。对此，历来褒贬不一。然其“诛乱尊王”的初衷，确实无可厚非。其记人，多引诗话、小说、俚语等，虽显杂芜怪异，然为后世了解南唐及宋初的民俗风情，提供了真实的资料。其记事，繁简不一，似失匀当。如《建国

谱》之叙地理，仅有军、州而无县，且立都金陵一句带过；《世系谱》自唐建王李恪即可，却上溯虞夏商。尽管如此，以纪传体正式记叙南唐史事，马令此书为现存首创，故功不可没。

现存世马令《南唐书》较早的版本，有明初刊本、明嘉靖二十年姚咨抄本和二十九年顾汝达刻本、汲古阁旧藏明抄本、明读书坊刻本、清嘉庆十四年墨海金壶本和十八年刻本等。另外，明代李清编有《南唐书（合订）》二十五卷。李清（1602—1683），字心水，明南直隶兴化人。清初，王士禛评该书曰：“取马、陆二氏之撰为经，别作《南唐书》，而杂采《江南野史》、《钓矶立谈》、《玉壶清话》诸书为纬，殊为有见。”乾隆中，该书原本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后因李清《诸史同异录》犯文字狱被撤毁，《提要》亦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剔除，故刊本罕见。仅见四库传抄本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马令《南唐书》，由濮小南据中华书局1985年刊印的清嘉庆十四年张海鹏校梓的墨海金壶刻本重新标点，除个别（如李景暹、李徵古等）人名外，将书中的繁体字、异体字，统一改为简化字；并对一些冷僻的典故，略加注释。

三

南宋陆游撰《南唐书》，18卷。

陆游（1125—1210）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字务观，号放翁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应礼部试，名列前茅，因论恢复，被黜落。孝宗即位，任枢密院编修官，赐进士出身；旋遭贬逐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起为夔州通判；八年，入四川宣抚使

幕，从军至南郑。范成大帅蜀，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，淳熙五年(1178)东还。七年，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，以发粟赈灾，被劾罢官。十六年，任礼部郎中，又被劾罢。闲居十余年，嘉泰二年(1202)被召修孝宗、光宗两朝实录，次年完成，升宝谟阁待制，致仕。《宋史》卷三九五有传。

陆游工诗、词、散文。南渡后诗人，陆游与尤袤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并称四大家，其诗多沉郁顿挫，感激豪宕之作。在政治上，陆游之鼓吹恢复，诋斥和议，亦为世所称道。然而另一方面，陆游的史才、史识，却也在其极盛的文名与爱国的称誉之掩盖下，较少为坊间所知、为学界所重，陆游传世至今的唯一史著《南唐书》之境遇，即为一例。

首先，陆游是否著有《南唐书》，或有疑者。早则如元修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南唐书》十五卷，不知作者”；近则如卢苇菁撰《〈新修南唐书〉作者考辨》(《史学月刊》1982年第4期)，指出此“不知作者”的《南唐书》，可能即是胡恢所作。而陈光崇《论陆游〈南唐书〉》(《中国史研究》1984年第2期)、朱仲玉《陆游的史学成就》(《浙江学刊》1983年第4期)等文，则从与陆游生活时代相接的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之说，以及此《南唐书》中《刘仁贍传》“论曰”透露的陆游“自述”线索，认为乃陆游所著无疑。笔者无意于介入这场争论，只是点校一过，由陆游之行迹、思想、主张诸端论之，愈加坚信此《南唐书》出自陆游之手；至于当初书未署名的缘由，则元人戚光《〈南唐书〉音释》“惟陆游编取折衷成此书也。游亦不著名，

以他书序而知，岂时以私著避也”的推断，颇为在理，而戚光之于《南唐书》以及“折衷”、“私著”云云，又涉及了陆游《南唐书》的几个关键问题。

其次，陆游《南唐书》有个被重新“发现”的过程。据元人赵世延《〈南唐书〉序》，天历（1328—1330）年间，监察御史王主敬谓赵曰：“公向在南台，盖尝命郡士戚光纂辑《金陵志》，始访得《南唐书》，其于文献遗缺，大有所考证，裨益良多”，于是嘱博士程熟等校订，镂版与诸史并行；又明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，王穀祥《〈南唐书〉跋》云：“余尝阅宋马令《南唐书》，未及见陆放翁书也。闻陆子虞家藏宋刻本，借而读之”；又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周在浚《〈南唐书笺注〉凡例》：“元人赵世延尝命戚光纂《金陵志》，始得陆书，为之音释、刊行。予因辑纂《金陵广志》，亦取陆书而注之。皆以其有关于金陵也。”据此可知，其一，陆游《南唐书》自淳熙年间（陈光崇推断在淳熙十一年即1184年前后）成书以后，虽有宋刻、元刻，但都流传不广，或因“游亦不著名”之故？其二，戚光访得《南唐书》并考知为陆游作品，是因纂辑《金陵志》，周在浚作《南唐书笺注》，亦因辑纂《金陵广志》；如此，陆游《南唐书》在元的被重新“发现”并音释、刊刻，在清的被笺注并更广流传，都与纂辑金陵即今南京文献之举关联，其间缘故，又“皆以其有关于金陵也”，这既是件有趣的雅事，也是值得深思的史学现象。

有趣的雅事者，浙东山阴陆游的《南唐书》，须待江南金陵文献纂辑之机缘，而获“发现”、表彰与广以流传，此不赘

述；值得深思的史学现象者，则需联系上文的“折衷”、“私著”与“有关于金陵也”申说之。

先说“折衷”。在陆游之前，已有胡恢、马令著《南唐书》。马书自为陆游得见并多所参考；至于胡书，陆游《南唐书·烈祖本纪》“论曰”提及“自烈祖以下”，胡书“谓之‘载记’”。苏丞相颂得恢书，而非之曰“云云，玩其文意，陆游可能并未见到胡书全帙，但知其大概情况。而陆游所以再著《南唐书》，除了具体人物设传与胡马两家之书颇有不同、更加着意于表彰忠节与宣扬风教等等以外，尤为关键者，是就大义言，陆游不满于胡氏贬谓南唐三主昇、璟、煜为“载记”，而马氏贱称之为“书”。陆游《南唐书》“自烈祖而下皆为纪”，即视南唐为承唐的正统王朝，而非偏霸或者僭越的政权。对此貌似“折衷”、实为颠覆，关乎整个南唐历史地位的认识，前人多有称道。如宋陈振孙《解题》之“颇有史法”，元赵世延“序”之“最号有法”，明毛晋“跋”之“得史迁家法”，已经隐约可见这层首肯；至清周在浚《笺注》，更是直揭而出，褒扬陆游《南唐书》“足继迁、固。三主名纪，俨然以正统归之，其识见较马令超远，可与欧阳公《五代史》相匹，非诸伪史可比也”。然而，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褒扬华汉、贬抑夷胡的传统史识，陆游《南唐书》甚不契合蒙元、满清之非汉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，若清之四库馆臣即否陆书三纪，指其“谬矣”，有所保留地予以肯定者，惟“取其叙述之简洁可也”。其实陆游《南唐书》岂止“叙述之简洁”！

再说“私著”。清之四库馆臣本有揣测之语：“游乃于烈祖、元宗、后主皆称本纪……得非以南渡偏安，事势相近，有所左袒于其间乎？”实际无需揣测，陆游《南唐书》其意正在于此。陆游平生主张抗击女真金朝、恢复宋室江山，一贯反对屈辱条件下的所谓“议和”；陆游著有《高宗圣政草》、《孝宗实录》、《光宗实录》等史书（今皆失传），深谙中国传统史学的鉴戒与致用。如此的两相结合，史书合为时而作，也就特别表现在其《南唐书》中。随举两例。《元宗本纪》“论曰”：

唐有江淮，比同时割据诸国，地大力强，人材众多，且据长江之险，隐然大邦也。若用得其人，乘闽、楚昏乱，一举而平之，然后东取吴越，南下五岭，成南北之势，中原虽欲睥睨，岂易动哉！不幸诸将失律，贪功轻举，大事弗成，国势遂弱，非始谋之失，所以行之者非也。

又《朱元传》“论曰”：

亡国之君，必先坏其纪纲，而后其国从焉。方是时，疆场之臣，非皆不才也，败于敌，未必诛，一有成功，谗先杀之，故强者玩寇，弱者降敌，自古非一世也。南唐如陈觉、冯延鲁、查文徽、边镐辈，丧败涂地，未尝少正典刑。朱元取两州于周兵将遁之时，固未为隼功，而陈觉已不能容，此元之所以降也。元降，诸将束手无策，相与为俘

累以去，而唐遂失淮南，臣事于周。虽未即亡，而亡形成矣。欲知南唐之亡者，当于是观之。

相信熟悉南宋与金之南北对峙、南宋任用或非其人或见疑忌等等史实的读者，由此二论，自然就会联想到南宋之国情与人事。质而言之，陆游撰述《南唐书》，尊李昇、李璟、李煜为纪，是尊偏安的南宋为正统、贬拥有中原的金朝为僭伪；颇异于胡恢、马令两家的立传人选、去取标准、排列次序，是意在劝善惩恶、鞭挞奸佞、斥损朋党；而诸多的“论曰”，评价得失兴亡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非为南唐而发，乃为南宋而发也。然则这样的影射当朝、针砭时事，或有触讳之隐患，或遭流俗之口诽，此陆游虽著书而不署名的缘故？果然如此，那么元人戚光“岂时以私著避也”的判断，可谓深知陆游者也。

又说“有关于金陵也”。南唐定都金陵，南唐史事，举凡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科技、信仰、迷信等等，或多或少总与金陵有关；如此，“芟薙稗秽，折衷诸家”，“重友于，戒佚思”，黜斥怪诞，往往考补无遗的陆游《南唐书》，对于了解、研治南唐时代金陵史事或者金陵地方南唐史事，自是不应或缺的重要文献。此其一。其二，陆游《南唐书》中所记诸多金陵掌故，如《烈祖本纪》之昇州城制度壮丽、作北郊于玄武湖西、放诸州所献珍禽奇兽于钟山，《元宗本纪》之保大十一年大火，《后主本纪》之金陵宫阙先设鸱吻、后不复用，《周宗传》之古台城所设都统府规模，《刁彦能传》之筑堤为斗门以息秦

淮水患，《陆昭符传》之御宫门立金鸡竿，《李建勋传》之钟山别墅、放意山水、不知葬所，《冯延鲁传》之望赐玄武湖，《韩熙载传》之畜妓与葬梅岭冈谢安故墓侧，《刘洞传》之后主读其石城诗而感怆不怡，《伍乔传》之主司升堂置酒以延中选者，《萧俨传》之元宗作大楼而俨谓“比景阳，但少一井耳”，《刘承勋传》之内帑别藏德昌宫贪腐事，《卢郢传》之都城烽火使韩德霸遭殴，《后主国后周氏传》之群花间作极小之亭，《齐王景达传》之后苑泛舟，《申渐高传》之雨畏抽税，《浮屠传》之军民诵救苦菩萨、声如江涛，等等。其中，独见于陆书者，自然可宝；与他书存异者，可资考证；而与他书相映者，亦可引为证据。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历为都城的今日南京之研究状况与现实遗存，即南唐之前的六朝，备受研究者重视，南唐之后的大明、太平天国、中华民国，文献丰富，遗存尚多，因而同样受到研究者重视，相形之下，承前启后的南唐，除了传统考古领域的“南唐二陵”与近年渐得关注的南唐城市考古课题以外，广泛、系统、深入的探讨仍然较为缺乏的境状，则陆游《南唐书》对于南京历史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来说，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，还有待全面的发掘与多方的推扩。

借此次匆匆点校陆游《南唐书》的机会，写下以上粗浅的认识，权充“导读”；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本书纳入的是“南京稀见文献丛刊”，故此不多的文字，内容颇有偏重，略述甚至未及陆游《南唐书》的“一般”情况，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参阅上揭之陈光崇、朱仲玉二文与本书“附录”里的

相关材料。

最后简单交代点校的相关事项：

版本。明嘉靖二十九年(1550)，王穀祥“闻陆子虞(按子虞为陆游长子)家藏宋刻本”，借而抄录之；嘉靖四十三年(1564)，钱穀(叔宝)又据王抄本过录；1934年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即据钱抄本影印。此次点校，以此影印本为底本，对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明《秘册汇函》本、参校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后所附张元济据明末汲古阁刻本(是本以《秘册汇函》焚余版及毛氏家藏抄本互订而成)所作的“陆氏南唐书校勘记”；遇有疑惑不明、模糊难认之处，又或检核相关史籍如《资治通鉴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、今人陈尚君辑纂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。凡底本、对校本、参校本两可者，以底本为准；间有对校、参校之本较底本于义较优长较胜出者，则或改或校，并出页下注表之。又有特别值得指出者，笔者曾见2004年杭州出版社《五代史书汇编》中收有陆游《南唐书》新点校本，初时觉得再作点校，或为重复劳动；及至翻阅一过，见其点校错误甚多，竟至有不可理喻者！古人常说“学识如何观点书”，看来斯言确实不虚，得暇，笔者拟另行撰文，讨论杭版陆游《南唐书》点校之误。至于此次的重新点校，也因此避免了无效劳作之谓也。

附录。底本原有赵世延序、王穀祥跋、钱穀跋；点校过程中搜集到的四篇时代较早的相关解题、题辞、跋，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清四库提要、民国张元济跋，则置之书末，作为“附

录”，以便读者参照。

陆游《南唐书》点校分工：先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胡箫白改繁为简，并初步点校一遍，再由胡阿祥复核、细校、标点，撰述“导读”（即此篇“导读”之“三”）；又点校过程中，南京出版社卢海鸣编审提供了很好的建议，在此谨致感谢！

濮小南 胡阿祥

2010年4月于南京

总目录

南唐书(马令)	1
南唐书(陆游)	203